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 「吳園」：邊陲內地富庶氣勢的山水凝映及原鄉想望—清中葉吳麟舍家族在台灣府城的古典園林空間美學建構

'Wu Garden': 'Shan-Shui' Reflection and Homeland Yearning of the Imposing Local Affluence in New Periphery-inner-land - Spatial-Aesthetical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Classical Garden by 'Wu-lin She' Family in 'Taiwan Fu-cheng' during Middle Qing Dynasty

doi:10.6154/JBP.2010.16.002

建築與城鄉研究學報, (16), 2010

Journal of Building and Planning, (16), 2010

作者/Author：蕭百興(Steven Pai-Hsing Hsiao)

頁數/Page：17-37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10/12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6154/JBP.2010.16.002>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 (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 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吳園」：邊陲內地富庶氣勢的山水凝映及原鄉想望— 清中葉吳麟舍家族在台灣府城的古典園林空間美學建構

蕭百興*

‘Wu Garden’: ‘Shan-Shui’ Reflection and Homeland Yearning of the
Imposing Local Affluence in New Periphery-inner-land —
Spatial-Aesthetical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Classical Garden by ‘Wu-lin
She’ Family in ‘Taiwan Fu-cheng’ during Middle Qing Dynasty

by

Steven Pai-hsing Hsiao

摘要

位於台灣省台南市中心的「吳園」，由吳氏家族建於清道光年間，乃是當時台灣最為重要的園林建築，具體表露了在台灣內地意識已然萌生下，台南府城作為全台富庶文教中心的城市慾望。其在歷史的摧殘下，雖已不復全貌，然從殘剩的園林景致仍不難窺探當時可能的盛況。本文主要希望將吳園置入當日具體的城市社會權力脈絡之中，藉由歷史及文化研究的視野，對「吳園」築構的空間美學作一解析，除瞭解其山水及庭園構築的美學邏輯外，亦將釐清此一空間美學建構與吳氏家族以及台南府城發展間的複雜關聯，俾以點出吳園倚勢構築的深度空間意義。

關鍵詞：台灣府城、台南城市、中國古典園林、吳園、空間美學、建築史、清代

2008年4月25日收稿；2009年1月19日第一次修正；2009年2月27日通過。

*華梵大學建築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中華地方美學建築協會理事長

Associate professor & Chairperson, 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e, Huafan University, Taipei County, Taiwan, R.O.C.

通訊：+886-918063995；+886-2-26632102 轉 4700；pshsiao@ms24.hinet.net；223 台灣·台北縣石碇鄉華梵路 1 號 華梵大學建築學系

承蒙兩位匿名評審提供寶貴建議並匡訂誤失，使本文多所增色，特此致謝；本文為「國立中正大學台灣人文研究中心 2006 年空間景觀群專題研究計畫—『清代以前臺南城市的時空發展及美學』」部分成果，特此致謝；本文曾以較簡要形式發表於中國古典園林國際研討會(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Classical Garden of China)，主題：傳統與傳播(Subject: Tradition and radiation)，中國山東省濰坊市，2006 年 8 月 18-21 日，中國建築學會建築史學分會(Chinese Society of Architectural History)與山東省濰坊市人民政府(People's Government of Weifeng City)聯合主辦。

ABSTRACT

‘Wu Garden’, which was erected by Wu Family during the reign of Emperor Dao Guang (道光) of the Qing dynasty (清朝) in downtown area of nowadays Tainan city, is the most important Chinese classical garden of its time. Its building, under the condition of the bourgeoning of inner-land consciousness, obviously displayed the emerging desire of abundant Tainan Fu-cheng as the cultural and intellectual center of Taiwan. Though it has been damaged partly under the destruction of historical power, we could find the ever-existed prosperity through the ruins. By relocating Wu Garden as a pseudo-text into the concrete context of urban-social power, this paper, with the help of the vision of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study, aims to dig out deeply the spatial aesthetics of the building of ‘Wu garden’. Besides studying its aesthetical logics of the shaping of Shan-sui and garden, the author hopes to handl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nstruction of spatial aesthetic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Wu family and Tainan city. So we can finally make clear the deep spatial meaning of the socially imposing erection of Wu garden.

Keywords: Taiwan Fu-cheng, Tainan city, Chinese Classical Garden, Wu Garden, Spatial Aesthetics, Architectural History, Qing Dynasty

一、前言：吳園作為台灣空間開發歷史見證的意義

隨著台灣的開闢，涵納了漢人文化重要精髓的傳統庭園亦陸續傳入了台灣，從荷據、明鄭以迄清季，不管是流寓的士人，還是致富的商賈等，率多有構築庭園的記錄，其中，由府城鹽業巨室吳尚新(名麟，素稱吳麟舍(註1)，官名尚新；字勉之，號勵堂；乾隆 60 年(1795 年)生)主導興建的傳統庭園—「吳園」即是著名的例子。根據台灣知府鄧傳安於吳園落成時所贈「漱藝留芳」匾的上款—「道光庚寅仲春」及相關史料推斷，至遲到了清道光 10 年(1830 年)，以興建者吳尚新家族姓氏為名的「吳園」已幽雅而氣派地出現在當時台灣府城(註2)「枋橋頭」一帶(亦即今日台南市公園路與民權路、民族路交口一帶)(註3)(圖 1)，其除了造有被稱為「樓仔」的巍峨房舍，也配佈有假山傍依、亭廊迴環的幽靜園池，不僅引起了一般市井的注目，也聚攏了諸多雅集文士的稱頌，乃是中國古典庭園(Chinese Classical Garden)在東海台灣傳播、發展的一頁璀璨篇章。



圖 1 吳園範圍推測圖
(財團法人成大建築文教基金會，1999：2-6) (註 4)

從既有資料可知，這是一座起造於城市之中與巨室交遊生活有關、而非位於山野、用以靜修的樸質庭園。事實上，吳氏家族會在清中葉選擇台灣府城耗費巨資營造傳統庭園，固然有其承傳自漢文化的關聯，然更與清代台灣、以及府城的發展脫不了關係。當時，正是台灣自乾隆、嘉慶年間邁入全面開發而初步有成之際，台灣已從清初的蠻荒之地轉而成為糧產的豐熟、甚至出口之地，透過台灣府城等海港城市展露了一定的富庶。吳氏家族雖從事鹽產的生意而非直接的糧

商，卻無可避免地得利於此一情勢的發展。故而，吳園的出現其實一定程度徵見了台灣空間開發的特殊意義，乃是漢民族台灣拓墾成果的具體展現，值得吾人予以深究。

本文書寫之目的，主要即希望就吳園興築與台灣開發以及府城發展的關係作一考察，不僅在此城市-地域發展的整體脈絡下探究其所具有的特殊空間意義，同時更希望揭露其作為城邑交遊庭園賴以營造的設計論述、以及蘊含於其中的美學表徵。如此，吾人不僅可以更清楚地理解台南城市本身的發展，同時也將可以為台灣乃至中國後續園林研究及實踐找到更為堅實、而能夠賴以攻錯的重要基礎。

二、鹽滷專賣蒸凝的世俗結晶：吳園在邊陲府治內地化繁庶發展的脈絡中興起

吳園會以空前繁盛的庭園之姿出現在道光年間的台灣府城，與漢人在台灣的拓墾以及台灣府城的發展具有著密切的關聯，相當程度見證了嘉慶、道光乃至咸豐年間(以下簡稱為嘉、道、咸年間)台灣逐漸被視為內地的意識滋長變化。回顧歷史，康熙 22 年(1683 年)即被施琅揮軍取下的台灣，雖在次年即成功擺脫了棄留爭議而被正式納

入了清帝國的版圖，卻未能同步扭轉其素來被清廷視為「化外之地」的邊陲命運。誠如《荅洲文稿》所述，對清廷來說，台灣不是「無仙蹤神跡之奇，無樓臺觀宇之勝，有山則蔓草頑翳，有水則洪濤鹵浸。為鹿豕狸鼠之所蟠，龍蛇蜃虺之所游」(轉引自蘇同炳，1969：74)，便是「溪深林密，易於伏莽；山海氣濕，又多霧露水土之害」(轉引自蘇同炳，1969：74)；再不就是「民五方雜處，非俘掠之遺黎，即叛亡之奸宄。里無一姓，人不一心」(轉引自蘇同炳，1969：74)。在此狀況下，康熙之所以將之收入版圖、設置府縣，所圖者並非經濟之利益，甚至也不是要其變成拱衛東南四省之屏障(註5)，而係基於不令其再度淪為「盜藪」、「亂源」、以及反清勢力巢穴的考量(許瑞浩，1988)。故而，吳園所在的台灣府城雖因官府設治而在康熙年間有所發展，卻主要基於政治監統的因素，希望藉之而能在海禁等政策的配合下有效地控制台灣的移民，扮演的主要是一化外之地意識形態下皇權鞏固之監統中心的角色(蕭百興，1990)。

有意思的是，清廷雖設下了渡台禁令，但一波波的移民迫於生計卻持續地從閩粵湧入了台灣，不僅推波了漢人急速往北臺拓墾的進程，同時也促成了台灣以及府城本身地位的轉變。這乃是因為，得利於中北部土地的全面開墾，逐漸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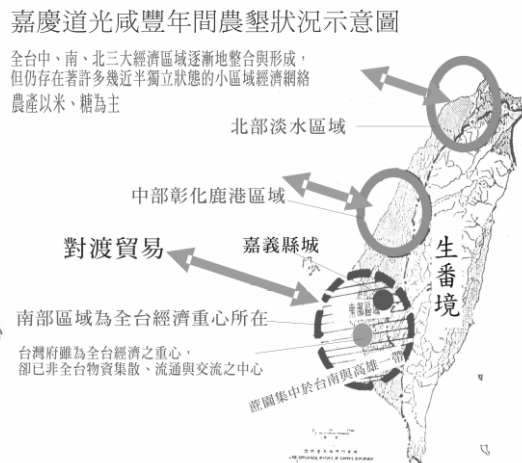


圖 2 從清初到清中葉台灣農墾及台灣府城經濟地位示意(蕭百興繪)

為米、糖重要產地、且有實力平糶內地的台灣已累積了經濟實力，並反過頭來改變了朝廷對於台灣的觀感。在此趨勢下，雍正、乾隆年間清廷雖仍舊將台灣視為與內地殊異之處，卻已注意到了其所潛藏的經濟利益；到了嘉、道、咸年間，一方面，南、中、北三大經濟區域已然確立並透過對渡方式與閩地形成了各自的市場圈，閩台之間在經濟系統的支撐下有了緊密的結合(圖 2)；另一方面，蔡牽事件也讓清廷驚覺到保護台地經濟果實的重要，「內地意識」於是在官民之間普遍萌發並有了長足的發展。當時的台灣，因為經濟實力而日益崛起的民間團體如三郊等已成為弭平蔡牽動亂的重要憑藉，並藉由戰功獲得了與地方政府平起平坐的地位；約莫同時，本土文士階層亦已陸續崛起，並透過功名科考而躍上了歷史的舞台，成為催動社會-空間實踐的關鍵性力量(蕭百興，1990)(圖 3)。在此狀況下，承續了雍、乾年間(甚至更早)即曾出現的私家庭園傳統(註6)，由富紳或科甲文士所興建的庭園如遂初園、吳園、潛園、歸園、北郭園、卯橋別墅與宜秋山館等(註7)於是紛紛出現在台灣以城鎮為主的地景之中，成了台地邁向富庶、文治的最佳見證。其中，尤以吳園所在的府治台南最為顯著，佔了最多的質量。畢竟，拜南部區域作為全台經濟重心之賜(註8)，向來為全台政治運作中心的台灣府城不僅累積了傲人的財富，而且成為文化輻射的樞紐。可以這麼說，其作為一處內地意識萌芽下經濟富厚的文治中心，召喚了以士紳(紳商、文士)階層園林想像為主導的空間營造慾望，而吳園，正是此一富庶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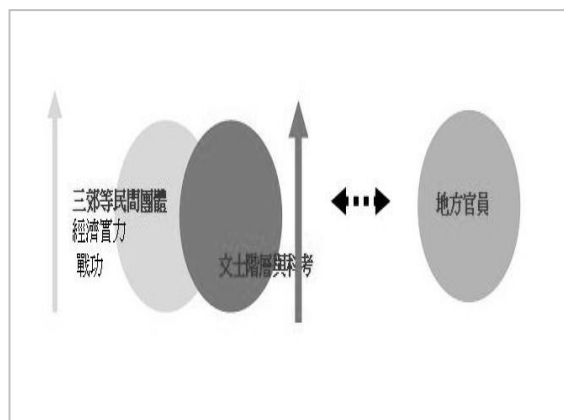


圖 3 清中葉台灣府城主要社會權力主體關係示意(蕭百興繪)

市空間慾望的最經典代表。

回顧歷史，吳園修築者吳尚新所屬的吳氏家族，乃是清中葉以官、商兩棲身份活躍在台灣府城一帶，終而累積巨量財富，成為台地首富的重要典型(圖 4)。吳氏家族的興起，吳尚新之父吳春貴可說是關鍵性人物。據載，原名吳晃的吳春貴(春貴為官章，字平圃)在乾隆 53 年(戊申，1788 年)即經嘉義縣學出貢成為拔貢生，捐納候補通判，而躋身為台灣府的重要士紳(註9)。或許是因為這個身份，加上其父吳元光所奠立的基業(註10)，讓他能夠在嘉慶初年即以「吳恆記」之公號涉入鹽專賣事業，承辦了「六屬販館」中利潤最為優厚的兩縣販館(台灣縣與嘉義縣)的專賣業務(註11)，從而掌握了財富累積的管道。整體來說，吳恆記開張之初一度擁有的利潤機制，雖曾在嘉慶 6 年至 14 年(1801-1809 年)間因為蔡牽將其在沿海所搶私鹽傾銷台灣而受到挫折，卻隨即在蔡牽被王得祿追擊落海死亡後，重新展露了生機。弔詭的是，蔡牽事件雖為吳氏帶來了財務上的衝擊，讓他幾乎瀕臨破產(註12)，卻也使其有機會「募水陸義民，攻破洲仔尾，議敘隨帶軍功加一級紀錄二次」(網資 02)，而「以戶部候補郎中議敘」(網資 03)，從而奠定了其在嘉慶 19 年(1814 年)赴京出任戶部廣西司郎中的基礎(註13)。吳氏的擔任京官，一方面讓其有機會推動台灣以重量取代容量的量鹽方法，並藉由衡器的採用而讓官鹽販售得以標準化，從而提高了流通的效益；同時，亦使吳氏家族在台灣府城以官紳為主導的社會-空間系譜中取得了至為關鍵的地位(註14)。藉由經濟制度變革與社會關係提升的兩相為用，吳氏家族因而為自身財富的積累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十分明顯地，吳氏家族正是靠著政、商相互支援的運作模式而獲得財富鉅量累積的契機：吳氏堂兄弟，三年期間(1814-1817 年)一人在朝為官，另一人則在家鄉掌管實際販鹽業務，交叉支援下，共同撐起了吳氏家族的龐大事業。故而，當吳春貴嘉慶 22 年(1817 年)京官任滿、於次年經故鄉泉州返台，而由吳春祿手中接回家業時，即有總計多達 107 萬兩的獲利。豐厚的財富不僅使得吳春祿在分得一半利潤後能夠選擇在磚仔橋北

吳氏家族先世

由太倉（明太倉衛，清為太倉直隸州，後來的江蘇省太倉縣）梅里分徙南至福建安平（清時改為安海；今晉江市安海鎮）

七傳後再分遷至泉州郡城

十世吳國美（乾隆年間），由泉州遷居台灣

名乾，官名國美，字純亭，太學生，候選州同

「安平十世、泉城四世、台灣一世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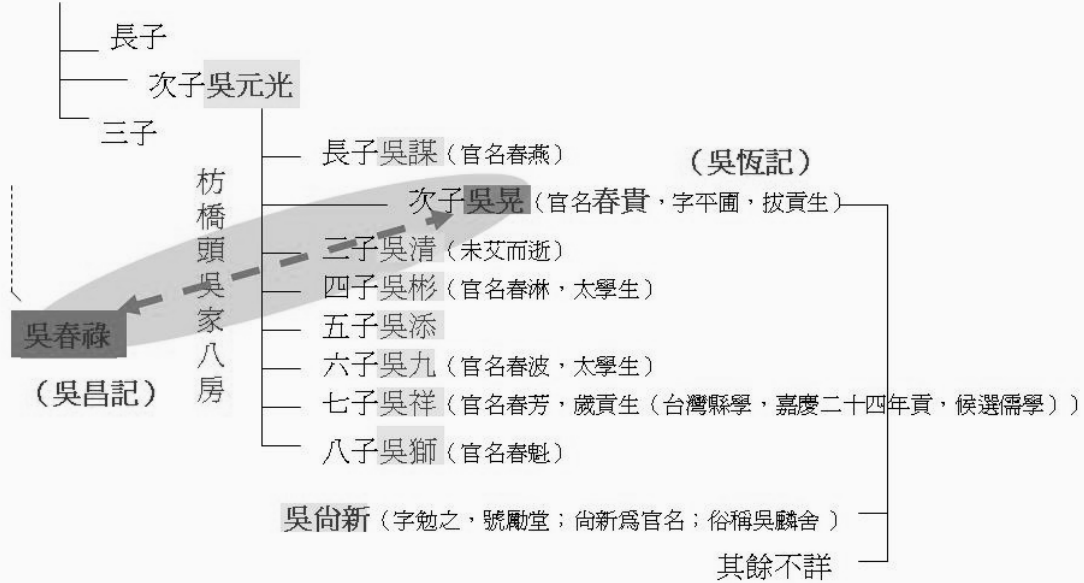


圖 4 吳氏家族譜系示意(蕭百興繪)

面建宅第、自立為「吳昌記」，吳恆記在不久由吳尚新接掌後，亦得以展開更為遠大的宏圖。從殘存的史料可知，原名吳麟、素來被稱為吳麟舍的吳尚新亦依循了父輩投入功名以求縉紳之途，透過了捐官而得候補通判、補用員外郎，道光 22 年更赴京銓選，獲補授刑部員外郎，最終並獲賜「中議大夫刑部四川清吏司員外郎加四級」(註15)榮銜。在此基礎上，吳尚新更緊抓機會，於道光 4 年(1824 年)受命於新任台灣知府鄧傳安，一肩擔起洲南場的徙建事宜，以期解決該鹽場在道光 3 年(1823 年) 7 月因曾文溪暴雨、台江浮覆而被毀的窘狀。由於選址適切，加以採用了改良式的鹽灘構造(註16)，吳氏不僅為官鹽增產做出了貢獻，同時亦為自身累積了更多的財富，而成為連雅堂筆下的「府治巨室」(連橫，1964：252)。有意思的是，除了經商外，吳尚新亦參與了當時與文士有關的活動。從史料可知，至遲在道光 9 年至 10

年之間(約當吳園興修之際)，吳氏即已與陳國瑛、楊文顯、蔡國香等文士共同採訪了台灣的風俗紀事，而編寫成《臺灣採訪冊》一書(註17)；而後，更曾在道光 15 年間，與生員劉衣紹、六品職員蔡植楠等主導了台灣府學禮樂局「修製各種樂器，協正音律」(轉引自杜潔明，2003：18)之事，除了曾「專往閩浙內地招募樂師，教息諸生」(轉引自杜潔明，2003：18)外，更於「春秋聖廟祭典前數日，召集諸生練習，屆釋奠日晨循儀演奏，以隆聖典。」(註18)可見，善於經商而逐漸為府城士紳的吳尚新在吳園修建期間、甚至更早，當與文人有所交誼，且應已具有文人的相關心態與習癖。而這，其實是符合當時吳氏家族體認自己屬於文士之一、並參與台地文化事業的自我定位的，事實上，不僅是吳春祿、吳尚新等獲有功名，誠如張炎昆在《以成書院一五〇週年特刊》中指出，吳尚新之子吳孰禮亦為舉人，且曾在咸豐年間捐

贈鳳山大竹里大租業地以供府城禮樂局籌措運作所需之資金(杜潔明, 2003), 可說符合了其父祖一貫以資財捐贊地方重要文化事務的家風。

在此狀況下, 吳尚新會於父喪之後敦請名匠修築吳園便饒富深意。其雖非清中葉台灣唯一的私家庭園, 惟誠如「有樓仔內的富, 沒樓仔內的厝; 有樓仔內的厝, 沒樓仔內的富」(廖漢臣, 1953: 36)此一俗諺所示, 卻是當時最為堂皇、最具規模的一處庭園。功名、財富與文士品味顯已在此交匯一氣, 道盡了吳氏家族藉由世俗權力與商業壟斷以遂行社會晉陞及財富積累的歷史過程。難怪, 吳園要以「吳」字來加以命名, 「吳園」一辭雖具有文學承傳的典故(例如梁蕭子範〈聽蟬詩〉:「輕飛避楚雀, 飲露入吳園」; 南宋陸游〈懷山南〉:「至今夜夜尋春夢, 猶在吳園藉落花」), 卻更強烈地表彰了屬於吳氏家族的名號, 直接而明顯地說出了台地士紳階層藉由細膩的政商操作而靠鹽業發跡的傳奇。凝映了山水氣勢的吳園於焉是一座得利於鹽滷專賣而在地蒸凝的世俗結晶, 其既表彰了台灣府城在內地意識萌芽下日益外顯的富庶之感, 同時, 也展露了士紳階層亟欲藉由文化以上參宇宙自然、進而追求人間榮耀的世俗想望。

三、盤據於官府、商舖交界的樓仔內庭園：吳園作為紳商交誼空間建構的都市地誌



圖 5 乾隆 17 年(1752 年)府城城池圖(王必昌, 1961)

吳園現存的面積雖不大, 然觀諸當日它東到民族路二段 173 巷、西至民權路二段 64 巷、南界民權路二段、北達原遠東百貨臨民族路處的範圍(圖 1)(盧嘉興, 1967a; 財團法人成大建築文教基金會, 1999), 卻具有相當的規模, 可說一定程度展露了吳氏家族藉由官商交互支援而終至富可敵國的氣勢。饒富意義的是, 吳氏家族躍昇為府治巨室的內涵非僅表現在吳園規模龐大一事之上, 同時, 更顯現在其所坐落區位的特殊性。吳園雖是一處幽靜的庭園, 然從嘉、道、咸時期台灣府城的空間結構視之, 其座落所在卻絕非荒郊野外, 而係城牆以內東安坊的精華之處。以乾隆 17 年(1752 年)的「府城城池圖」(王必昌, 1961)與嘉慶 12 年的「府城城池圖」(謝金鑾, 1958)(圖 5, 圖 6)來說, 吳園所在的枋橋頭皆位於地圖的中心, 而且是十字街(舊稱大街)商業區直接接壤東安坊內台灣府署、察院衙等衙署所在的重要環節。換句話說, 這是台灣府城中心區域一處同時扼有政經運作之利的重要地段。一方面, 誠如陳文達(1958)在《台灣縣志》中所述:「大枋橋在東安坊, 嶺後通渠之中, 官府往來之所也」, 明鄭時即位於官府往來要衝的枋橋頭, 入清之後因為府署等官衙在東安坊的設立而持續維繫了其作為官府往來之所的重要地位。

另一方面, 得益於府治作為全台經濟中心之故, 枋橋頭在入清之後, 亦因總縮了府治東西向經濟主幹(註 19)的地利之便而日漸呈顯了重要性。從史料可知, 至遲到了康熙 59 年(1720 年)陳文達修撰《台灣縣志》時, 隨著大街的四向擴張



圖 6 嘉慶 12 年(1807 年)府城城池圖(謝金鑾, 1958)

及鋪上石板 (註20)，吳園所面臨的「枋橋頭街」已經從原有的大街獨立分出、而出現在十字街(此時大街已改稱十字街)與嶺後街之間，見證了在郁永河(1959)《裨海紀遊》記載中，曾經「街市以一析三，中通车行，傍列市肆，彷彿京師大街，但隘陋耳」的繁盛大街 (註21)，其經濟力量已然東擴到枋橋頭一帶，並終於蔚成了街肆(黃典權，1975)。難怪，海防同知方邦基會在乾隆 10 年(1745 年)將整座橋樑重建，而嘉慶 3 年(1798 年)吳春貴、韓必昌與黃拔萃等地方仕紳更鑒於木構橋樑容易傾毀之故，鳩眾將之改造為磚石橋樑。乘此趨勢，枋橋頭街終於在嘉慶 11 年(1806 年)由韓必昌與莊德生等的倡修而成了 51 丈 8 尺的道路(謝金鑾，1958；財團法人成大建築文教基金會，1999)。如此事實在說明，這是一處官、商交界之處，面臨東西向枋橋頭街的吳園因而一方面西臨俯瞰著商業繁盛的十字大街，同時也東接仰望著日常政治運作的重要權威區域，甚至，其亦可很快地通達鎮署與道署等處 (註22)(圖 7)。相較之下，釋志遠所建的遂初園、許遜榮營造的卯橋別墅、以及吳尚霽起造的宜秋山館等，區位即沒有吳園來得優越：宜秋山館與卯橋別墅雖位於城內，但皆不如吳園所佔的位置來得核心；至於遂初園則根本就建於東門城外，徹底地遠離了府治政經的中心。



圖 7 吳園所在枋橋頭空間區位重要性示意

吳園位於城市中心、盤據官商之間的區位選擇顯然透露了當日吳氏家族縱橫在官與商之間的特殊關聯，區位作為空間的重要面向，在此訴說了空間生產中所經常糾結的權力面向。可以這麼說，吳恆記作為一個藉由官、商間關係獨特經理

而興起的家族，會將宅邸及庭園的位址選擇於此並非是偶然的，位於府治經濟通渠中心、同時接壤了官府所在的區位優越性，不僅有益於財富的宣示，同時，想必亦給予吳氏家族以社交經營上的特別便利性，讓其更容易優游於官商之間而保障既有的鹽館專賣利益。誠如盧嘉興(1967a; 1967b)的研究，吳恆記雖然早就位於枋橋頭，但只有宅邸，直到吳尚新承鄧傳安知府之命移建洲南場而讓家業達到頂峰之後，方才將北鄰荷據時何斌府第庭園的舊址加以蒐購，依照地勢闢建成庭園，而與既有位於南邊的房舍合為一體，成為台南俗諺中所稱的「樓仔內」的吳園(盧嘉興，1967a)。這一塊地勢陡降的低窪之地(註23)的納入，顯然為吳恆記提供了更易連接並貯存德慶溪水系流水的機會。事實上，綜合地方上相關的說法(註24)、以及日治時期開闢圓環後的市街地圖可知(圖 8)，發源自清水寺的德慶溪支流溪仔底在當時仍舊以南北之姿流貫了吳園所在的基地，而且幾乎是穿過現今存留的水池一帶後而與德慶溪交會，故而可以推測，吳園水域主要係順應地勢利用來自清水寺的溪仔底流水經營而成，造園者不僅以廊道區隔了南北兩處水域，更留有涵洞以溝通流水，俾以提供飲水、消防等生活實用之需，甚至，亦極有可能為吳家提供了一定舟楫的便利 (註25)。就此，戰後 1970 年代所留下的航測圖(圖 9)雖已不見溪流之蹤 (註26)，卻仍可見以北邊池水為基礎所改建的「水浴場」蹤影，相當程度說明了當時吳園池水接連德慶溪而提供生活之便的可能狀況。

值得注意的是，塘水的設置除了提供實質生活面向的需求外，顯然更具有社會性的功能。從盧氏的記憶、配合 1970 年代的航測圖(圖 9)可以推斷，在吳氏當年的園林擴築動作之中，瀕臨池水的南岸基本上是被設置為「花廳」所在(此花廳在戰後因為年久失修而塌毀拆除)(盧嘉興，1967a)，相當程度印證了，吳園興築希望為吳尚新等提供以士人之姿縱橫於官、商之間的社交空間的特殊意涵，令人想起了明清之際，經商致富之內地士紳亦經常營造庭園以進行官場交誼的類似作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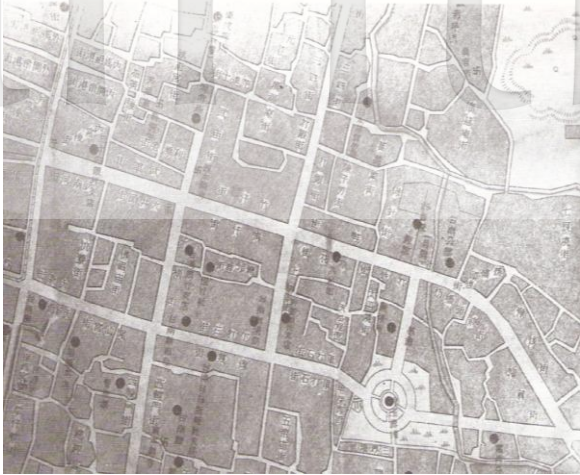


圖 8 日治時期闢出圓環後的市街圖，可見坑子底溪注入德慶溪之狀況(李乾朗，1998：1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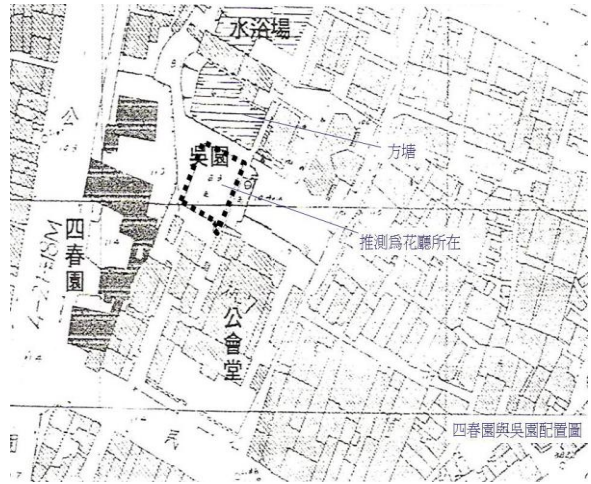


圖 9 根據台南市政府都市計畫課民國 60 年代航側圖繪製的「四春園與吳園配置圖」(財團法人成大建築文教基金會，1999：2-7)

故而，雖然沒有史料直接描述當年吳尚新健在時的庭園使用情形，然從花廳與庭園配置之關係，佐以後來施士洁、許南英等諸多文士曾在吳園徜徉的狀況，仍不難想像當日吳氏仿明清官場

舊習，藉由吳園而進行聚宴、甚至以文會友、進而聯絡官場情誼的可能景象。從「台南市の中心部」(圖 10)、「台南公館キ四春園台南醫院ノ望遠(台灣)」(圖 11)兩張日治時期舊照片、以及 1970



圖 10 日治時期「台南市の中心部」照片(註 27)



圖 11 「台南公館キ四春園台南醫院ノ望遠（台灣）」（日治時期明信片（局部），約 1920 年代）

年代的航測圖(圖 9)綜合判斷，當時參與盛會的文人，除了有可能經由吳氏建於後來公會堂一帶的宅第(亦即俗稱的「樓仔」)外，亦有可能係直接經由接連於街上的獨立入口而經由院落或巷道而來到花廳所在的庭園區域的。在此類場合中，花廳顯然是原有樓仔房舍與庭園廊道、乃至於廊道以外水域及「東園」(註28)彼此串成一氣的重要空間。作為一處中介延伸的連接空間，花廳既是隔絕也是開展的所在，其一方面隔絕了吳氏家族世俗的生活場域，同時也藉由與池水對岸以廊道接連的兩座軒亭(作礪軒(註29)及水亭)的彼此呼應，開展了以庭園遊賞為主之社交生活的可能。誠如曾國恩、張玉璜等研究指出，日治時代作礪軒「遇特殊場合，即作為戲台使用，賓客立於水池四周觀看」(財團法人成大建築文教基金會，1999：2-12)。對照明清時傳統中國庭園經常作為官場社交的使用習慣，這一至少包含了花廳、北側包涵兩座軒亭的廊道(分為東西兩段，東段合作礪軒、西段終點為水亭)、以及西側臨水小徑而被以塘水為中心重新連成一體的空間(註30)(圖 12，圖 13，圖 14)，想必在吳尚新在世時(註31)即可能已

提供了府城士人類似遊宴的功能，而讓戲曲、詩文等藝文在水、酒的映襯下，激盪出文士、官員對於彼此身份的認同。難怪，與吳尚新私交甚篤的知府鄧傳安在吳園落成時會送上「漱藝流芳」的贈匾，具體透露了他對於文人雅士能與吳園交相沖漱、彼此成就，以便萬世流芳的深邃慾望。對於鄧氏的呼喚，同治末、光緒初年吳尚新義女之子施士洁進士即以詩文做出了回應，施氏(1965)《後蘇龔合集》中與吳園有關的四首詩篇，不僅是吳園塘水漱藝的具體成果，同時也留下了當時文士藉由雅集而與吳園交會的雪泥鴻爪。舉例而言：

飛觴賭韻集吳園（定），海上相逢笑語溫。
半畝方塘眠乳鴨（西），數株古木嘯仙猿。
春濃於酒可人意（樹），草碧似油留雨痕。
欄外午陰群籟寂（澗），座間清話眾音喧。
危樓好擬藏經閣（定），近水先開得月軒。
寄傲煙霞容我輩（西），偷閒泉石亦君恩。
濁醪敢憚千回醉（樹），佳句何妨一夕論。
文字因緣真不偶（澗），雪泥鴻爪記今番

（定）。（施士洁〈春日同朱樹吾、楊西庚兩明府、梁定甫拔萃集飲吳家園聯句〉同治末光緒初）

也許，正因吳園的空間功能切合了鄧氏等一千文士的欲求，直到清末、甚或日治，這座位於樓仔內的庭園都還以它一息尚存的軒亭塘影聚斂了諸如連橫、許南英等士人充滿了物色感興的社交雅集。這些事跡在在提醒我們，吳園看似平靜的塘水，在其被建造、甚或構想的那一刻起，其實已超越了生活的實用性而成為吳氏家族縱橫官商的社會生活中，聚斂情誼、傾訴人生的重要憑藉，對於當年與吳恆記家族有關的人來說，其既具有個體人生的涵養效用，也積極發揮了鞏固、中介吳氏家族專擅鹽場的權力運作功能。



圖 12 吳園老照片，可見作礪軒主控整體塘水之情形；日治時拍攝但年代未詳(松本曉美、謝森展,1993)



圖 13 黃天橫藏吳園老照片，可見臨塘水亭及其旁假山之情形；日治時拍攝但年代未詳(盧嘉興, 1967a)



圖 14 四春園的日治舊照片(註 32)

四、山巒飛來水映的世俗氣勢經營及原鄉想望

誠如上述，道光初年建成、盤據於台灣府城城市中心官府與商肆交界的吳園，藉由花廳等空間功能的配佈，提供了吳氏家族與官員、士紳等進行雅集之交誼場所，俗稱「樓仔內」的吳園於是充滿了不同於樓仔外世俗生活的異質性，成為吳恆記家族鞏固既成專賣權勢、表徵自身社會地位的具體象徵。然而，吳園之所以成為吳氏家族表彰自身的重要豐碑，除了擁有花廳之類得以進行交誼雅集的空間功能外，更在於其所具有的獨特而充滿象徵意涵的空間經營手法。一如其他江南園林經常以高牆隔絕塵俗的慣習，吳園主要的空間經營亦採取了隔絕的手法。從其通常被稱為「樓仔內」的說法可知，這種隔絕當是透過富麗堂皇的「樓仔」及圍牆等元素而被架構出來的。具有一定高度的「樓仔」不僅是吳氏家族生活起居以及與外界直接往來(極可能是商業往來)的所在，同時也是位於北邊內部庭園的首要屏障。可以這麼說，面對著外在枋橋頭街逐漸興繁的生活作息，雄偉樓仔的起造既具體地作出了社會財富的宣示，同時亦大體隔絕了內外，為吳園作為一處異質空間的營造奠定了重要的基礎。而正是在此前提下，吳尚新藉由廊道、圍牆等的進一步迴



圖 15 日治中期 1930 年代「台南嶺後街及枋橋頭一帶之空照」(註 33)

環圈圍，隔出了一方不同於世俗生活的幽靜空間，以至於連雅堂在書寫〈台南古迹志〉時會讚賞其「雖居城市之中，〔卻〕饒有山林之趣」(連橫，1964：252；〔〕中文字為筆者所加)。這樣的環境效果，從日治中期 1930 年代「台南嶺後街及枋橋頭一帶之空照」(圖 15)實不難印證，舊照片中，沿著枋橋街接連十字大街的東西向主幹道兩側雖已房屋群聚，但相對於那時已昂然崛起的公會堂，仍屬低矮之建物，而且接鄰吳園的北側一帶，亦屬林木滿佈森蔭之處。以此觀之，在街肆尚未如日治時期發達的清末階段，位於樓仔內地勢低窪之處的吳園會享有極為幽靜的環境條件是可以肯定的，層層的圈圍讓其在周遭尚且素樸自然的環境中，擁有了可以進一步塑造屬於自身心靈境界的基礎條件。

吳氏所架構的無疑是一種樓仔「內」的空間聚焦，其中，具有一定風水意涵的方塘「龍門池」(註34)可說是焦點匯聚所在，乃是層層空間最終的定焦之處。從盧嘉興的記載可知，當年吳尚新對

於堪輿之術是頗有領會的，雖然現行的資料不足以確認吳氏心儀的風水流派，然經由盧氏的研究、以及吳氏後人的認肯可知，吳園之興築確實是具有濃厚的風水考量的。親蒙吳氏後裔吳魁等指點提供資料的盧氏記載：「除重大事外，業務都交由其家長(台灣稱經理為家長)辦理，而親自與堪輿師入山尋覓營葬的吉地，所以領會了山水、林泉的自然景勝。就將北鄰何斌庭園舊址收購，沿著地勢的高地構建庭園……。」(盧嘉興，1967a：19)在此考量下，塘水的引用除了可以提供實質生活功能的作用外，顯然亦不免有風水上聚氣的意涵，畢竟，在漢文化傳統的風水論述中，住屋甚至庭園中引水以藏風納氣、以利聚財的觀點是相當普遍的(于希賢，2005；曹林娣，2005)。被層層樓仔、房舍、圍牆等所圈圍而出的一塘碧水「龍門池」於是靜照了人情、反映了世事，暗涵了吳尚新企圖藉之點納祿氣的空間意涵，相當程度透露了吳氏家族躋身全台首富的世俗想望。

一方塘水之所以具有如此效果顯與吳尚新的

巧費心思脫不了關係，在吳氏聘請工匠的精心經營下，近在一旁的德慶溪支流溪仔底的流水被巧妙地引注而入，不僅與作勢以拱形涵洞浮立其上的廊道及水亭彼此折映，而且，和著遠風帶起了生生不息的感受，難怪施士洁在〈立春日吳園〉一詩中會慨然寫道：「最好迎春花信早，遠風吹動活亭臺。」水，於是成了一方宇宙映照的中心，其看似平靜，卻在沉殿中隱含了流動，泌泌地浮映著在其之週遭人間亭台的戲劇起伏。有意思的是，除了週遭的房舍、軒亭之外，塘水更收攏了自然，呈現了物色。從配佈上看來，水塘的西側即是著名的疊石假山「飛來峰」，與塘水構成了庭園至為關鍵的要角，在在宣示了這是一座以山水為主調的庭園；而緊依塘水之上的作礪軒一旁，則是連雅堂所曾述及的「東園」，整座庭園以塘水為中心的週遭，可說是處處充滿了自然的景致。就此，連雅堂(1964：252)在〈台南古迹志〉中說道：

枋橋吳氏，為府治巨室，園亭之勝甲全臺；而飛來峰尤最。疊石為山，……峰下有塘，水清而綠。上為作礪軒，其旁有園曰東園。樓臺花木，隨地布置，高低曲折，各占其宜……。

難怪，清末乃至日治時的文人雅士在此聚集之時，仍會憑欄而對花、樹、鳥、猿、月等物色有所感受，並發出了細膩的吟詠：

半畝方塘眠乳鴨（西），數株古木嘯仙猿。春濃於酒可人意（樹），草碧似油



圖 16 吳園老照片，約攝於 1900 年(中神長文編，1985)

留雨痕。欄外午陰群籟寂（澗），座間清話眾音喧。危樓好擬藏經閣（定），近水先開得月軒。寄傲煙霞容我輩（西），偷閒泉石亦君恩。（施士洁〈春日同朱樹吾、楊西庚兩明府、梁定甫拔萃集飲吳家園聯句〉同治末光緒初）

六角水亭涼欲雨，主客團坐笑相語。方塘半畝荷未開，使人惆悵花前杯。……醉後憑闌嘯一聲，驚走南枝幾箇鵲。（施士洁〈李毓南尹招馬子翊校官、楊端孟孝廉、朱可堂內史、凌英如參軍，飲吳園地上〉光緒四年四月二十二日）

昨夜西風緊，涼夜生光暈。今宵白玉盤，皎潔絕塵分。清輝遍小園，月來花亦韻。……乘風欲歸去，玉宇瓊樓斬。舉頭月正中，時已三更近。（許南英〈王子中秋吳園小集對月分韻〉）

春花侵曲檻，新月醮平池。獨倚飛峰下，無端感黍離。（連雅堂〈南社小集〉）

從這些詩作隱約可知，作礪軒、水亭以及西側廊道上所設置的美人靠等座椅無疑提供了士人俯身接近、探尋自然的最佳空間，欄杆上彎曲的線條不僅靈點了生活的步調，同時更強化了既有軒亭出挑水面的感受，從而為雅集的士人創造了憑欄融入以塘水為中心之自然物境的有利條件(根據相關照片判斷，兩邊透空的西側廊道上立柱間設置有美人靠座椅；作礪軒則有內曲欄杆；水亭亦



圖 17 吳園老照片，約攝於 1900 年(中神長文編，1985)

有欄杆，惟欄杆外則尚有可以站人的步口)(圖16)。在此同時，從日治時代留存的照片可知，連雅堂觀察中「迴環洞達」(連橫，1964：252)的假山亦提供了穿梭其間、近臨水岸的機會(圖17)。難怪，雅集的士人會如此切身地感受到，花就在跟前，月就在其中。沉澱而偶爾因風生波的塘水在此，顯已就其鏡射折晃的本質創造了一個介乎虛實之間的空間，有如在宇宙底層置放了一面鏡像，迷離地映射出了屬於吳氏家族在世存有的特殊姿態。

不時發生在吳園中心的這種映射，若從一方塘水與飛來峰所共同構成的對比關係來看，尤顯得真切。根據連雅堂與盧嘉興等記載，吳尚新當日構築吳園時除了看重水的部份外，對於「山」的樣態亦十分重視，故而聘請了名匠「仿漳州城外的飛來峰的形勝，築造假山」(盧嘉興，1967a：19)。對吳氏而言，沉澱平靜的水與高大雄偉的山無疑是構成吳園風景的兩大關鍵，而且缺一不可。誠如連雅堂在介紹吳園時說道：「而飛來峰尤最」，並指出其係「疊石為山，高數丈，大二十餘丈，迴環洞達，邱壑天然，絕構也。」(連橫，1964：252)這一座看似天外飛來的石山，在蒼勁林木配襯下，顯係極盡能事地透過「迴環洞達」等手法展現其仿效「邱壑」的「天然」之姿，而且被擺置於碧水的倒影之中，具體地映襯、凝鍊了吳氏家族召喚故鄉懷想及追求富庶氣勢的雙重想望。

一方面，假山名為「飛來峰」顯係來自對於漳州城外山巒之勢的模仿，亦即，得之於對故土名山勝景的積極擷取，可說相當程度展露了吳氏家族對於「閩地故鄉」的懷想。從盧嘉興的記載可知，吳氏家族先世即由太倉(明朝太倉衛，清時為太倉直隸州，即後來的江蘇省太倉縣)梅里分徙南至福建安平(清時改為安海)，七傳後再分遷至泉州郡城，到十世吳尚新的曾祖父吳國美(註35)時(乾隆年間)，方由泉州遷居台灣。吳國美所生三子中的老二吳元光即為吳尚新祖父，所謂的「枋橋頭吳家八房」(盧嘉興，1967b：16)乃是元光所生八子分立而成(註36)(圖4)。相對於其他渡台人士或有忘祖之嫌，吳尚新一脈則相當重視與閩地故鄉的連結，這從他們墓碑上所鐫「安平」(註37)

字樣即不難得知；對他們來說，吳國美雖為開台始祖，卻也是安平、甚至泉州世系中的一環，故而稱之為「安平十世、泉城四世、台灣一世祖」(盧嘉興，1967b：16)。這也就是為什麼吳春貴在入京為官返歸之時，要途經泉州故鄉省親，並攜回族譜一卷之故。其後，吳春貴之堂弟吳春祿甚至將族譜加以重訂，並在〈重訂族譜自序〉中道盡了他本人乃至整個家族思鄉、並期待延續香火傳承的濃濃情緒(轉引自盧嘉興，1967b：16；文中()中年號推測極可能為盧氏所加)：

台灣多泉、漳二郡人，其先世來遊斯土也，謂非吾欲久居是也。暫處之，則亦暫置之耳，其後立室家長，子孫而竟居是也。暫置之，則亦暫忘之耳，後之人泯滅無聞無論矣。幸而能自樹立，慨然念水源木本，不惟故老無存，即族譜之遺佚散失亦已久矣。忘祖之誥，曷以免焉。吾族自太倉州梅里來閩，世居泉之安海，值前明鼎革，七世祖實齋公徙居晉安郡城，至十世祖純亭公於我朝乾隆間客游台灣，遂家于崧城，及余之身甫三世矣。憶余少時聞先伯叔談安海故鄉事潛聽久之，私念異日成立，必欲一到故鄉省墳墓，宅里訪先世遺跡。而人事蹉跎因循未果，心竊咎之。嘉慶戊寅(二十三年，西元一八一八)功兄平圃宦京師，歸道經故里攜族譜一卷渡臺，余心悅焉。然歸省之心終不少置，道光乙酉(五年，西元一八二五)長男尚雯，鄉試內渡命順途歸省，戊子(八年)又重至焉。辛卯(十一年)功弟占卿舉於鄉，長男亦與優薦，遂回籍拜省祠、墓，歸述其事，余心稍慰。甲午(十四年，西元一八三四)冬，余因公內渡省垣，事完南下，迺克便道抵籍，恭詣祠廟瞻拜流連，既又偕族人遍視先墳，間有荒圯，盡築而新之。顧余將老矣，歸省之念至是甫得一償，世事滄桑再來不知何日？若不及今譜載詳明，他日子若孫，代久年湮，其于源流分合之由，安保無遺佚散失之憾也。既還東瀛，因取族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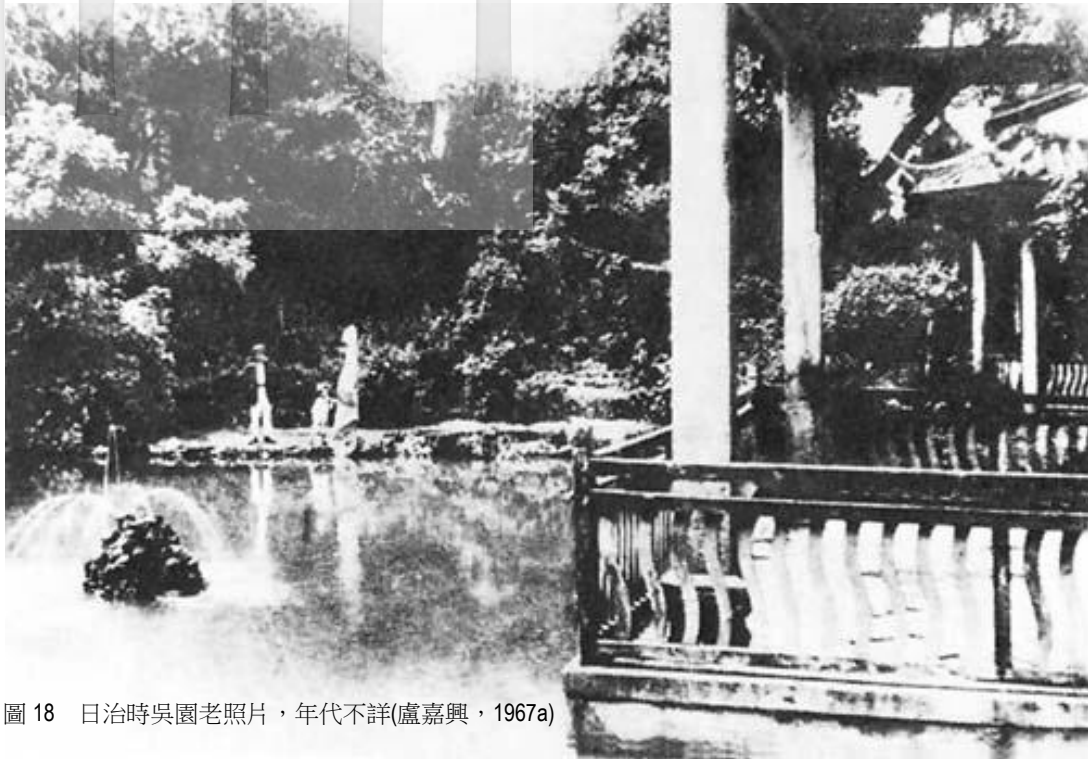


圖 18 日治時吳園老照片，年代不詳(盧嘉興，1967a)

一篇而彙次之為立字派、別世次，併彙臺及泉之支派，而增譜之。……余幸其規模粗具，可以示後人使無所自也。併願後人踵而繼之，使無忘者，永無忘也。

從吳氏的言談可知，吳家上下對於故土懷有一種濃濃的情愫，在此狀況下，吳尚新修築吳園會仿漳州城外飛來峰之姿而設置假山便饒富深意。漳州城雖非吳氏家族所曾遷居之地，卻與安海、泉州同屬閩地，其地山水景物具有「飛來」特色而可茲仿效之事，想必極有可能曾經激起了吳尚新等對於故土／原鄉文化的崇尚孺慕之情，故而興起了以之作為典範的想法，吳園的興築因而相當程度展露了吳氏家族思歸鄉土的密密濃情。

另一方面，飛來之峰與塘水「龍門池」的相互映照更突顯了吳氏家族追求富庶表徵的重要意義。吳尚新之所以仿效漳州城外的山水之姿固有其追懷原鄉的絃外之音，卻也同時涵納了他對於山石必須具有氣勢的想望，所謂「飛來」之意在乎取其勢之奇險、雄偉，某種程度符合了風水砂、

龍論述對於山巒必須延伸龍脈的觀點，呼應了吳氏家族追求世俗功名卓然有成的具體想望。有意思的是，吳氏雖想望功名利祿，雖憧憬氣勢，卻必須委之以文雅而婉轉的外衣。綜觀吳園內塘水、假山與軒亭的配置關係，飛來峰根據連雅堂的描述除了人可能得以穿梭其中外，主要乃是一座用以「側賞」的假山，憑欄文士以側賞之姿與假山的遭遇(假山在人之右)雖可感受到吳園山水所欲營造的磅礴氣勢，雖可感覺到「數株古木嘯仙猿」的幽森之感，卻又不致產生與之正面對視的衝突與壓迫感(圖 18)。換句話說，遊賞者乃是以一種較為優遊的姿態而與山水所具有的氣勢進行交會的，甚至於還會產生如連雅堂所曾提及「獨倚飛峰下」(連雅堂〈南社小集〉)的庇護之感。在此狀況下，以方塘為主要中心的吳園於是成了一座山水氣勢在此終極收斂的「小園」(許南英〈王子中秋吳園小集對月分韻〉)，成了許南英與連橫等體會月光垂直靜照的清輝之地。

也許正因感受到了如此氣勢的適度收斂，吳園水塘北側廊道上的作礪軒與水亭只是出之以臨

水的簡直之姿。根據曾國恩等調查，日治以前，基本上它們所呈現的只是較為簡樸而慢直的屋頂形式(前者為捲棚歇山頂；後者則為歇山戲庵簷頂(註38)；水亭屋頂雖曾出現起翹的正脊，兩座軒亭屋頂亦有帶著一定曲線的垂脊(葉乃齊稱之為以兩條垂脊取代一條戲脊形成「戲庵」)，卻不見如江南園林般具有大幅度快速曲線揚起之姿的「翼角翹起」作法，其配合著東段廊道北側實面壁上的八角和圓形窗洞，構成了吳園中簡直凝鍊的整體性氛圍。誠如上述，這是一種蒙上了文雅素樸之姿的「勢」的處理，透露了吳尚新家族作為實質的商販集團在藉由官場支援取得專賣權力而致富後，仍要以文士之姿而展露自身的一種特殊心態結構，相當程度反映了傳統社會中先士而後農、而後工、而後商的地位想像。這乃是因為，明清之際商人地位在小商品經濟蓬勃發展的支撐下雖有提升，但士仍為社會之主流，仍為皇帝以外得以掌權的首要角色，故而士人之風雅仍為社會之首想，仍為社會風習之所向。在此狀況下，吳尚新會被民間模仿官制暱稱為「吳麟舍」，並發動以「士人」風雅文化為基礎、強調將氣勢收斂在靜謐山水之中的簡直庭園營造，便具有一定的意義。表面上看來，這是一處由動轉靜、進而成境的文士庭園，卻仍在不经意间藉由閩南世俗的色彩及語彙介入而流露出了吳氏家族游刃府城官商追求世俗想望的強烈企圖。在此，不僅隱隱流動的波水曾經一再地照看了人間戲曲在此園中盡情搬演的抑揚頓挫，同時，曾經為碧水所沉澱的種種寧靜，也將在遠風微揚的晃漾中，反襯出一絲特屬於利祿人間、特屬於富庶府城的喜慶之感。

五、代結論：吳園召喚了內地意識 滋生下，邊陲地域富庶氣勢的 山水凝映及原鄉想望

吳園作為一座傳統庭園會於道光年間出現在台南府城並非是偶然的隨興之作，而係表徵了特殊的社會、乃至文化空間意涵。從上述的研究可知，吳尚新之所以能夠啟動吳園的修築，與台灣本身經濟的成長脫不了關係，可以這麼說，吳園乃是清中葉內地意識萌發下，台灣府城富庶積累

的具體成果。事實上，也正是在此深厚的社會基礎上，乾隆年間方才遷居台灣府城的吳氏家族方才得以藉由功名之途以提昇並維繫其被稱之為阿舍的社會地位，同時也反過頭來取得了官鹽專賣的絕大權利，並分工合作地促成了財富的鉅量積累。在邊陲府治內地化繁庶發展的脈絡中興起的吳園，於焉是一座鹽滷專賣蒸凝的世俗結晶，道盡了吳氏作為紳商巨室呼應城市發展的具體慾望。

而正是在此根基上，被稱為「樓仔內」的吳園會坐落在當年台灣府城聚落中心已然逐漸蔚城街肆的枋橋頭之處，並透過隔絕的建築手法配合陡降的地勢弔詭地取得了幽靜的效果。其區位不僅位居府治東西經濟幹線之樞紐，更是直接接鄰府治官署、並易於聯繫其他官衙的通衢所在，其位處於官、商交界的空間配佈，可說巧妙地見證、中介了吳氏家族以社交雅宴等官場交誼方式縱橫於官商之間的具體成果。也正是因為肩負了如此任務，以樓仔等建築隔絕都市塵俗的吳園一旦設立，便要藉由花廳、塘水與軒亭等之巧妙佈置以超越純粹實用性的使用之需，俾提供吳氏家族藉由與文士、官紳之屬的文娛、聽戲等雅聚生活以鞏固既有社會成果的積極功能。在此狀況下，以塘水為中心的吳園空間於是成了一方藉由宇宙的窺探以照見人世起落的迷離鏡像，提供了眾多文人雅士在此乘著酒性、戲韻而與自然物色進行感應，俾以體驗人生、想望宇宙的可能空間。

從相關的記載可知，這是一座以山水為主調的庭園，吳氏藉由工匠巧手將奇山置於「龍門池」水邊的精采作法，不僅為吳園畫下了重視氣勢的基本格局，同時更呼應了風水堪輿之述對於藏風以納祿氣，疊石以導引龍脈的論述，相當明顯地突出了吳氏營造庭園的世俗慾望。從吳尚新會仿漳州城外景致以奇石營造「飛來峰」的作為觀之，吳園的興築一方面承載了念念不忘自身來自閩地的吳氏家族故土懷想的情愫，扮演了吳氏家族聊慰原鄉想望之苦的安慰劑角色；另一方面，奇石飛來映照水邊、配合了蒼森林木的氣勢經營，卻也同時說出了吳氏家族冀盼藉由官商的相互支援以持續維繫、並彰顯家族豐業的深刻慾望。有意

思的是，吳園中依稀對應著繁華富庶憧憬的氣勢經營，卻被有意地加以收斂了，軒亭、廊道、房舍等建築刻意處理所呈現出的簡直之感，讓氣勢的處理蒙上了一層屬於素樸文人的文雅婉約之感，委婉地道出了吳氏家族必須藉由文情風雅以縱橫官商之間的真實情景。被暱稱為「小園」的吳園於是成了一座藉由山巒飛來水映以持續原鄉眷戀、並進行世俗想望的寧靜庭園，一方幽靜而碧綠的塘水，雖不時沉澱了軒亭中人情與山水恣意交會的宇宙懷想，卻也不時會因為遠風揚起的波痕，而折晃出吳氏家族藉由閩南色彩元素所欲追求的世俗夢想。

註釋

註1 南方朔於〈大家有官做，有官大家做，官本位文化造就阿舍〉(2000)一文中研究指出：「中國古代時民間社會在各種行職業或其他稱號上，總是喜歡使用官名。……在仕紳地主階級裡使用得最廣泛的乃是『員外』與『舍人』。一般而言，『員外』年齡較長，『舍人』則較為年青，由於『中書舍人』等『舍人』的官職早在西晉初期就已出現，並一直延續到明代，因而民間使用『舍人』來指有錢的仕紳地主遂極為久遠。宋元兩代可能為了區分『員外』和『舍人』，而將官僚地主之家的子弟稱為『舍人』，而有了『舍人』如果一家有好幾個『舍人』，當然就會有『大舍人』和『小舍人』，簡稱『舍』、『大舍』、『小舍』。例如《醒世恆言》第七回即有『尤大舍』，《二刻拍案驚奇》第三十九回則有『你不是某某舍麼？』之句。至於太小的『舍』，則稱『阿舍困』。

以『舍人』及『舍』稱官宦及仕紳地主之家的子弟，在中國南方極為普遍，而閩台則都冠以『阿』字為首，故稱『阿舍』。」

註2 有清一代，台灣府大部分時間位於今台南市，因此，台灣府城大部分時間所指即台南市；光緒 11 年台灣建省，劉銘傳奏准將台灣省分為台南、台灣與台北三府，台灣府才成為中路的建置名稱。當時，曾研議於台中興建台灣府城，後因劉銘傳去職而未能建成；由於如此建置上之變革，原台灣府城遂被改稱為「台南府城」；由於本文所述主要是清中葉時期吳園所在的台南市，尚未改為台南府城，故通篇仍沿舊習稱之為「台灣府城」。

註3 曾國恩、林瑞明、張玉璜與曾國棟在《台南市市定古蹟「原台南公會堂(含吳園)」調查研究與修復計畫》中則推斷為在道光 7 至 10 年間(財團法人成大建築文教基金會，1999)。

註4 此調查研究暨修復計畫報告書頁碼係分章編輯，2-6 表示第二章 6 頁；未免與其餘註釋混淆，筆者特別將之改為 2_6，餘下類同，不再

說明。

註5 當時施琅雖已看出海防防線不在沿海港口而在廣大海域，並提出應藉台灣以控海峽，方能阻止紅毛船隊，而永絕邊海之禍的觀點，但朝廷的封疆大吏卻鮮有同樣看法，以致於台灣雖因足堪東南四省屏障之安全理由而被劃入疆域之中，卻沒有發揮其作為海防前哨與鞏衛臺海之功能(蕭百興，1990；2008)。

註6 清初台灣民間築建的庭園如下：李氏園，雍正年間富紳李文奇築於今台南市開元寺東南邊；書帶草堂，乾隆 34 年(1770 年)邑紳鄭其楫建於今台南友愛街附近；一峯亭，乾隆 43 年(1778 年)中書科中書林朝英建於今台南市民生路與民生綠園北邊轉彎處一帶；蘇萬利花園，乾隆年間台郡鉅商蘇萬利建於台南市東門路(盧嘉興，1967a)。

註7 清中葉台灣所建的庭園如下：遂初園，道光 5 年釋志遠所建，位於今台南市東門路；潛園，道光 29 年富紳林占梅建，位於今新竹市；歸園，道光年間富紳吳世繩建，位於今台南縣歸仁鄉；北郭園，咸豐元年進士鄭用錫建於今新竹市；卯橋別墅，咸豐元年邑紳許遜榮建於今台南市衛民街；宜秋山館，咸豐 7 年前舉人吳尚霽建於今台南市永福路與府前路交叉口東北角，曾為中國國民黨台南市黨部。至於清末台灣，則陸續有庭園之興建如下：留種園，士紳盧崇烈建於今台南市赤崁街赤崁樓對面；窺園，光緒初年進士許南英建於今台南市府前路馬公廟旁，舊址已為道路所吞沒；勵園，光緒年間舉人林鳳藻建於台南市天壇邊；林家花園，光緒 19 年富紳林維源建於今台北縣板橋；萊園，光緒 26 年耆宿林獻堂建於台中縣霧峰(盧嘉興，1967a)。

註8 清中葉以降，隨著台灣三大市場區域的興起，南部區域雖不再是台灣經濟的中心，但仍是重心所在，仍是台灣地區的整體富庶最主要的動力(蕭百興，1990)。

註9 根據謝金鑾主纂《續修台灣縣志·卷三學志·

軍功》(1958) 記載：「吳春貴，候補郎中。」從〈嘉慶二十年重修大觀音亭廟橋碑記〉(道光 5 年)(輯錄於《台灣南部碑文集成》)的捐費名單可知，除了在台的武將外，吳春貴社會地位排行在三郊之前。其文局部如下：「子爵軍門王捐銀一百五十元。澎湖協鎮陳捐銀十大元。臺鎮中營莊捐銀二十大元。臺鎮左營官捐銀二十大元。臺鎮右營林捐銀二十大元。北協中軍林捐銀二十元。戶部正郎吳春貴捐銀一百大元。北郊蘇萬利、南郊金永順、糖郊李勝興，各捐銀八十元。鎮安分府杜天奎捐銀六十元。內閣中書林朝英捐銀五十元。監生黃拔萃捐銀五十元。全郡緞緞舖金永和捐銀五十元。絲線郊捐銀四十元。臺郡餉典捐銀四十元。武生何元奎捐銀三十元。吳顯文等捐銀二十八元。大穆降眾舖戶捐銀二十一元。貢生張維新、職員徐炳文、曾振明、商船行保、草花郊、郭光殷、黃榮觀、嘉屬課館、彰屬課館，各捐銀二十大元。新興街眾舖戶捐銀十七元。臺屬課館、鳳屬課館、淡屬課館，各捐銀十五大元。膨船行、杉郊舖等、藥材郊等、張錦生，各捐十二大元。顏錦春、陳良模、貢生黃時成、監生王維翰、陳世名、董其山，各捐銀十大元。」

註10 根據盧嘉興(1967b：16)，吳元光「名華，官名元光，字素園，鄉飲郡賓。」吳氏乃是枋橋頭吳家基業的奠定者，其曾於嘉慶 4 年開元寺重修時，致贈木製對聯一副，聯為：「古刹重新崇佛宇；南壇依舊奠神居」，上款「嘉慶四年陽月」，下款「弟子吳元光敬立」；另，吳春貴兄弟多有功名，亦多取官名。

註11 台灣鹽制，清初雖曾沿襲明鄭徵課鹽埕餉銀舊制(依照鹽埕格(即今所謂結晶池)面積大小課征，而由鹽院奏銷，供作台灣府的軍餉之用)，允許鹽商在繳納餉銀後自由銷售(不繳餉銀之私鹽禁止銷售)，然到了雍正 4 年(1726 年)4 月即為了解決鹽商哄抬鹽價所導致的供需失調問題而頒佈了專賣鹽制，嚴禁人民私曬私賣。在此政策下，官方不僅在明鄭鹽田基礎上分設了四處鹽場(瀨北場、瀨南場、洲北場、

洲南場)，同時亦在台灣府治內設置了鹽館一處，聽各縣販戶莊民赴館繳課領單，而後執單至各場領鹽轉販各處；其後，因各販戶莊民每年銷額不等，便改由各縣當地士紳承辦，為縣屬販館，計有台灣、鳳山、諸羅、彰化四縣及淡水、澎湖兩廳，故稱六屬販館。

註12 蔡牽將沿海所搶之私鹽運來台灣沖銷使得官鹽滯銷，承辦販館蒙受嚴重損失，不僅未能達到承辦銷額，更因官府嚴催積欠之課價而陷入困局，幸因陳請滯銷量肆後逐年彌補獲准而得以獲得紓解並渡過危機。於今觀之，吳氏之所以得以陳情獲准，可能與其在事變當時出錢出力協助平亂的表現有莫大之關聯。

註13 吳春貴在出任京官時將吳恆記業務交給他的堂弟吳春祿代為經理，後者當時為吳恆記之「家長」，亦類同於今日所謂「經理」。吳氏堂兄弟，兩人一人在朝為官，另一人在家鄉掌管實際經濟業務，共同撐起了吳氏家族的家族事業。

註14 從〈嘉慶二十年重修大觀音亭廟橋碑記〉(道光五年)(輯錄於《台灣南部碑文集成》)的捐貲名單可知，除了在台的武將外，吳春貴社會地位排行在三郊之前。其文局部如下：「子爵軍門王捐銀一百五十元。澎湖協鎮陳捐銀十大元。臺鎮中營莊捐銀二十大元。臺鎮左營官捐銀二十大元。臺鎮右營林捐銀二十大元。北協中軍林捐銀二十元。戶部正郎吳春貴捐銀一百大元。北郊蘇萬利、南郊金永順、糖郊李勝興，各捐銀八十元。鎮安分府杜天奎捐銀六十元。內閣中書林朝英捐銀五十元。監生黃拔萃捐銀五十元。全郡紬緞舖金永和捐銀五十元。絲線郊捐銀四十元。臺郡餉典捐銀四十元。武生何元奎捐銀三十元。吳顯文等捐銀二十八元。大穆降眾舖戶捐銀二十一元。貢生張維新、職員徐炳文、曾振明、商船行保、草花郊、郭光殷、黃榮觀、嘉屬課館、彰屬課館，各捐銀二十大元。新興街眾舖戶捐銀十七元。臺屬課館、鳳屬課館、淡屬課館，各捐銀十五大元。澎船行、杉郊舖等、藥材郊等、張錦生，各捐十二大元。

顏錦春、陳良模、貢生黃時成、監生王維翰、陳世名、董其山，各捐銀十大元。」

註15 此一官銜見諸署期為咸豐 3 年 12 月的「吳尚新墓碑」(轉引自財團法人成大建築文教基金會，1999:2_10)。

註16 吳尚新在實地勘查後，擇定了乾隆 53 年經台灣道萬鍾傑劃廢的大田場舊址北面(亦即後來嘉義縣布袋鎮新厝仔一帶)，由其出資收購民墾作為新的鹽田基地，藉以取代被毀的安定里洲南場；吳氏因而籌劃興築新式鹽灘，改良了原先瀨口式與泉州式鹽灘的短處(盧嘉興，1967a)。

註17 《臺灣采訪冊》不分卷，為清陳國瑛等 16 人采訪(陳國瑛、林棲鳳、石川流、曾敦仁、蘇鳳翔、林師聖、楊文顯、吳尚新、蔡國香、蘇德純、吳廷箴、黃本淵、黃化鯉、吳春祿、翁守訓、陳肇昌等人所採集，其中以陳國瑛所採最多)，道光 9 年(1829 年)5 月至 10 年(1830 年)8 月間採輯，雖然沒有刊行，卻有抄本傳世。其中吳尚新即參與採訪，例如「嘉義縣城」、「彰化縣城」、「淡防廳城」、「噶瑪蘭廳城」、「城池」與「鳳山縣城」諸條目，即是由「楊文顯、吳尚新、蔡國香」合採(陳國瑛等，1959：15、16、22、23、25、29)，而楊文顯與蔡國香兩人皆為「例貢」(陳國瑛等，1959：199)出身，亦即不經考選，而由生員援例捐納銀米成為貢生者，皆屬文士之一。

註18 能參與府學相關活動係為清代文士的重要表徵，吳尚新參與府學相關事宜之記載證明其與當時文士走得相當近，甚至可能是文士之一。相關記載如：「翻復與府首謀樂器，員外郎吳尚新、生員劉衣紹、六品職員蔡植楠請任修，鐘、鏞、匏、鼓、琴、瑟、簫、管、磬、祝、祝、皆具。舞六佾六六三十六人，聘海內樂士，以時教童子習。……春秋上丁兩祀，肅清雅穆，歌者堂上，舞者堂下，無言奏假，彬口乎變海嶠為鄒魯闕李之風矣！」(劉鴻翱，1972：76-77)；林海籌於《同聲集》(台南樂局以成書院出版)所寫的序文〈雅樂十三音之由

緒)：「前清道光十五年，聖廟祀典恭備禮樂諸儀器，當時樂局董事士紳吳尚新、劉衣紹等，主倡修製各種樂器，協正音律，專往閩浙內地招募樂師，教息諸生。春秋聖廟祭典前數日，召集諸生練習，屆釋奠日晨循儀演奏，以隆聖典。」(轉引自杜潔明，2003：18)。

註19 十字大街兩端連通了西門與東門，為有清一代台灣府治的經濟主幹道(蕭百興，1990)。

註20 十字街之鋪設石板係由耆民吳振生出資(財團法人成大建築文教基金會，1999)。

註21 當時，大街街道已被改窄。雍正年間，官民已經因街道過寬之故而在中央建造雙面臨街的店舖，遂使得原來赤崁街的街道變窄，類同於一般街坊(石萬壽，1977)。

註22 臺郡另兩處官府分佈之處為位於鎮北坊的總兵衙署以及位於西定坊內的台灣道署及台防分府衙門，亦俱離吳園不遠(財團法人成大建築文教基金會，1999)。

註23 誠如吳昭明(2001)的觀察：「公會堂大門，一路到吳園，僅約短短百公尺，斜坡、階梯、小斷層，從南向北斜下，地形變化相當大」。

註24 台南地方對於德慶溪支流曾經流經吳園附近、而造成侵蝕地形的狀況多有流傳，例如洪敏麟(1979：8)即說：「德慶溪上源另一支流來自清水寺前，向北北西方向至民族路及公園路交會口東約 150 公尺處注入本流，約 400 公尺，古稱溪仔底。其谷頭侵蝕劇烈，平均每 100 公尺切鑿 1 公尺，因此將鷺嶺臺地東緣切斷，使其成為一孤立狀臺地。古時從大井頭街到府署，必須渡過溪仔底，因此架有『枋橋』以便通行。據蔣元樞重修臺郡橋樑圖說，該橋一邊為欄杆，另一邊以跨房屋代欄杆。本支流據傳曾有水流木被撈起，雕塑成水流觀音，奉祀於清水寺。古時之枋橋頭街，其街名亦由來於此橋」；而吳昭明(2001)亦說：「吳園西緣，原本有小溪。來自清水寺溪仔底的溪流，沿湯德章紀念公園，古鷺嶺東北麓，流經太平境教會，穿過枋橋頭街(今民權路南側)枋橋，進入

吳園。」

註25 根據曾國恩等研究，吳園水池範圍應比後來所留池塘大，所謂連接作礪軒的廊道基本上是跨在南北兩個水域之上。當時，在北邊水域未廢前，是可以通舟楫的(財團法人成大建築文教基金會，1999：2_12)。

註26 美軍於 1944 年為戰略所需而繪製的「台南市地圖」中雖可見德慶溪主流，卻也沒有看到溪仔底流水。估計此一水流已在日治後隨著台南公館的興築及市區改正的推動而被埋入地下。

註27 日治時期「台南市の中心部」照片，出處：http://bp3.blogger.com/_EPsSRad7Dgc/SAgLkWqYULI/AAAAAAAAADio/pd5KmrSqlg0/s1600-h/c, 20081130 讀取。

註28 根據曾國恩等研究，吳園塘水廊道北側應仍有水域。曾氏等說道：「昔日吳園水池之範圍，應廣達基地北側的舊市立游泳池一帶，而與德慶溪相通。現今池畔房舍下方尚存兩個拱形涵洞，即是南北兩水域連結之佐證；據當地耆老與社教館館員口述，泳池未廢之前，吳園之水可通達泳池旁水域，甚至可滑小船往來嬉戲。」(財團法人成大建築文教基金會，1999：2_12)就此一水域，以舊照片(圖 13)中水亭後方仍有屋脊的狀況討論研判，可能是一水院(2006/06/29 與葉乃齊討論)；另，根據連雅堂所述，作礪軒一旁則為「東園」(連橫，1964：252)。

註29 曾國恩等報告書正文曾作「作勳軒」，惟根據連橫及盧嘉興，應為「作礪軒」(盧嘉興，1967a：19)。

註30 葉乃齊從舊照片中飛來峰前曾站人的狀況推測，假山前臨水處設置有步岸(2006/06/29 討論)；另，有關於四春園的日治舊照片(圖 14)所顯示者可能亦是此水塘之景象，若是，則東側亦是園木扶疏之處，其間可能有通道連接作礪軒所在之廊道(照片中可見開有拱門)。

註31 吳氏於道光 28 年戊申，西元 1848 年辭世，享年 54 歲；咸豐 3 年癸丑，西元 1853 年卜葬於文賢里之崙仔坪(盧嘉興，1967b)。

註32 四春園的日治舊照片，圖片出處：

http://memory.ncl.edu.tw/tm_cgi/hypage.cgi?HYPAGE=image_photo_detail.hpg&project_id=twpt&dtd_id=10&xml_id=0000362480&subject_name=%e6%97%a5%e6%b2%bb%e6%99%82%e6%9c%9f%e8%87%ba%e7%81%a3%e5%9c%96%e5%83%8f%e5%af%ab%e7%9c%9f 20081130 讀取。

註33 日治中期 1930 年代「台南嶺後街及枋橋頭一帶之空照」，圖片出處：

<http://weber.tn.edu.tw/edu01/taian/main-1/main-1e.htm>，2008 年 11 月 30 日讀取。

註34 此塘原則上為東西長向之長方形，西側臨飛來峰假山處則為不規則形狀；另，此塘在 1950 年代末、1960 年代初之兩張「台灣省立台南社會教育館館舍平面圖」中，水池被稱為「龍門池」，估計可能為承傳既有之名稱。此兩圖見財團法人成大建築文教基金會(1999：4_24、4_25)。

註35 根據盧嘉興(1967b：16)：吳國美「名乾，官名國美，字純亭，太學生，候選州同。」

註36 根據盧嘉興(1967b：16)，吳元光所生八子為：長子吳謀(官名春燕)；次子吳晃(官名春貴，字平圃，拔貢生)；三子吳清(未艾而逝)；四子吳彬(官名春淋，太學生)；五子吳添；六子吳九(官名春波，太學生)；七子吳祥(官名春芳，歲貢生(台灣縣學，嘉慶 24 年貢，候選儒學)；八子吳獅(官名春魁)。

註37 根據盧嘉興(1967b：16)，由於吳氏該族係由太倉遷安平肇始，故而墓碑上祖籍地皆鐫「安平」。

註38 八角水亭的屋頂形式相當獨特，並沒有現成的名詞可稱，原曾國恩等稱之為硬山頂，過於簡略；經與葉乃齊就老照片討論(2006/06/29 討論)，再經筆者斟酌，稱之為「歇山戩庵簷頂」，「戩庵」取閩南語「ㄍㄨㄥˊ ㄨㄥˊ」之音意。

參考文獻

于希賢

2005 《中國古代風水的理論與實踐(上)(下)》，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

王必昌

1961 《重修台灣縣志》初版，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石萬壽

1977 〈台南市古蹟志〉《台灣文獻》28(1)：90-106。

李乾朗

1998 《台灣近代建築-起源與早期之發展 1860-1945》(1980初版)三版()，台北：雄獅美術圖書公司。

杜潔明

2003 《台南孔廟樂局—以成書院之研究》碩士論文，南華大學美學與藝術管理研究所。

吳昭明

2001 〈吳園——一個結束，一個開始〉《擺蕩一千年之交府城停格》網頁版 (2008/11/27 擷自：http://www.tnnet.com.tw/jsp/Pages/art/wu_book/text_12.htm)。

松本曉美 謝森展

1993 《台灣懷舊 1895-1945 The Taiwan》初版，台北：創意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施士洁

1965 《後蘇龔合集》初版，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洪敏麟編

1979 《臺南市市區史蹟調查報告書》，臺中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郝永河

1959 《裨海紀遊》初版，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財團法人成大建築文教基金會

1999 《台南市市定古蹟「原台南公會堂(含吳園)」調查研究與修復計畫》，台南市立文化中心委託。

曹林娣

2005 《中國園林文化》初版，北京：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

許南英

1962 《窺園留草》初版，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許瑞浩

1988 《清初限制渡臺政策下的閩南人移民活動》碩士論文，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研究所。

連橫

1964 《雅堂文集》初版，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陳文達

1958 《台灣縣志》初版，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黃典權

1975 〈古台灣府治海桑城坊考〉《台灣文獻》26(3)：42-43。

廖漢臣

1953 〈台南的諺語〉《台南文化》2(4)：34-39。

劉鴻翱

1972 〈臺灣府學重修夫子廟並祭器樂器記〉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關係文獻集零》臺灣文獻叢刊第309種，台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陳國瑛 林棲鳳 石川流 曾敦仁 蘇鳳翔 林師聖 楊文顯 吳尚新 蔡國香 蘇德純 吳廷箎 黃本淵 黃化鯉 吳春祿 翁守訓 陳肇昌

1959 《臺灣采訪冊》1829-1830；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初版，台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蔣元樞纂輯、國立中央圖書館特藏組編印

1983 《重修臺郡各建築圖說》初版，台北：國立中央圖書館。

盧嘉興

1967a 〈臺灣一大名園－吳園的築建者吳尚新〉《古今談》(25)：15-22。

1967b 〈臺灣一大名園－吳園的築建者吳尚新(續完)〉《古今談》(26)：14-18。

蕭百興

1990 《清代台灣(南)府城空間變遷的論述》碩士論文，國立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

2008 〈從海音澎湃的荊桐城到騷亂混現的神仙府：清代台南城市(台灣府城／台南府城)的時空發展及美學表徵初探〉戴浩一、顏尚文主編《台灣史三百年面面觀》1-132，嘉義縣民雄鄉：國立中正大學台灣人文研究中心。

謝金鑾

1958 《續修台灣縣志》初版，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蘇同炳

1969 《臺灣今古談》，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

南方朔

2000 〈大家有官做，有官大家做，官本位文化造就阿舍〉《新新聞》680，台北：新新聞，pp.122-123 (2006/05/15) 擷自：Google純文字快取 <http://www.new7.com.tw/weekly/old/680/680-122.html>。

中神長文編

1985 《台南事情》1900，成文復刻。

佚名

2002 〈嘉慶二十年重修大觀音亭廟橋碑記(道光五年)〉黃典權採訪所得《台灣南部碑文集成》網頁版(2010/02/05) 擷自：
<http://163.27.3.193/taiwan/Content/content.asp?bookno=218&chptno=349&startPage=1>
) 台北：聯合百科電子出版事業有限公司。